



走进大家书房  
遇见辽阔世界

我从本科开始就一直就读于中山大学哲学系,直到1991年博士毕业,期间阅读大多围绕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即所谓“四书五经”。对于任何一个想了解中国社会及文化“大传统”的人来说,这类书籍是不可或缺的。

完成博士论文《儒道互补》后,我的学术兴趣从“大传统”慢慢转向“小传统”。我开始好奇民间传统、基层社会和乡村经济,对普通人的日常产生浓厚兴趣。很难说“小传统”都经由“大传统”生发而来,但二者之间一定有密切关联。因此,尽管未曾修读社会学、人类学专业,对于“大传统”的深入了解使我在面对“小传统”时仍有优势之处。

这个转向早在研究生阶段就埋下了种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中,人手一本的《美的历程》(李泽厚著)让我发觉中国文化竟如此生动、如此有活力,好像历史一下子活现眼前。

在我读书期间,中大图书馆二楼有个专门向研究生开放的港台书库阅览室,每天都座无虚席。在那里,我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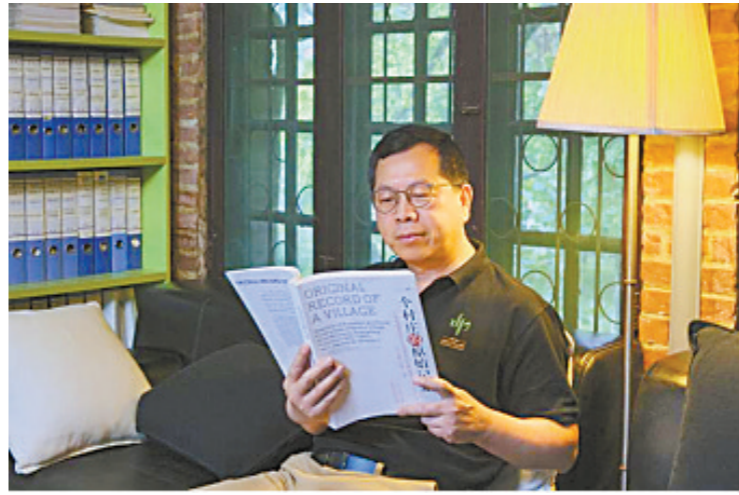
同辈人更早接触到港台学术著作。有两本书至今印象极深,一本是林耀华的《金翼》,这部人类学经典让我非常具体地看到中国乡村的社会经济活动与家族故事,在小说般的叙事中,家、家族、乡村社会一下子“活”了起来;另一本是陈正祥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这本书把空间拉得极大,在宏大的地理视野中理解中国文化中心的变迁与历史走向。虽然我读的是中国古代哲学,但这两本书也开启了我对“大传统”相对的“小传统”的兴趣。我对“小传统”的关注是从“民间信仰”切入的。在这个领域,武雅士《神·鬼·祖先》对我影响很大。这本小书基于作者在台北附近的三峡镇长期的田野调查创作,完全采取一种内部视角,笔端带着对信众的共情,而非以精英身份俯视。

这种视野的打开是持续性的,也引导了我研究的空间尺度发生变化。读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他那种将历史前后贯通、不局限于断代的做法,对我颇有启发。再后来,布罗代尔的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采用大空间、大时段的处理方式,更令我深受启迪。而在微观层面,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又一下子收缩焦距,带领我深入感知具体农户的生计与农业生产过程,体会“内卷化”的真实含义。

近年来,我对空间尺度的关注进一步聚焦到“隙地”上。我注意到,有些省际交界处的县,连续多年常住人口不降反增,这完全超出一概认知。我将这类边缘地带称为“隙地”。为什么“隙地”的常住人口在增长?它们有怎样的经济形态与社会结构在支撑?这几年来,趁着中山大学帮扶高州“百千万工程”之便,我带领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的团队,扎根于省际交界、常住人口增长的高州田野调查,试图探究“隙地”的活力从何而来。这类研究的出发点是《中国文化地理》打开的大空间视野,并经过华南乡村研究的具体沉淀,最终将目光落在具有结构性意义的边缘地带。

对纷繁世界的观察与理解,需要长时段、巨空间的视角,同时还需要洞



作者供图

吴重庆,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中山大学人文学院副主任、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馆长、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儒道互补》《孙村的路》《The Path to Sun Village》《超越空心化》等。

察其结构。费老的《乡土重建》尤令我手不释卷。在这本书的叙述中,传统中国社会不是平面化、同质化的,而是有阶层、有阶级的。这种阶级视角,在我后来反复研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时得到强化。若不具备阶级视角,根本理解不了中国革命发生的底层逻辑。将这种结构性视野纳入全球尺度的,是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这部四卷本巨著清晰呈现了当今世界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这些书在不同时期给我提供了观察世界的“取景框”。

说到田野,我常跟学生讲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一辈子能不能读1000本书?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行万里路在今天更是远远不够,做社会科学研究,一辈子起码得走十万里路吧。

总之,我的阅读史就是从大传统走向小传统、从大尺度空间聚焦乡村社会、最终步出书斋走向田野的历程。书房里的凝神静气,田野里的风吹日晒,再加上同道之间的四季切磋,共同构成了我完整的学术生命历程。

泛读又精读,苦中仍作乐

□宋剑华

本人书房原本无名,称它“烟熏斋”可也。书房面积15平方米,纸质藏书1000多种,电子藏书3000多种。我的藏书分为三大类:中外哲学社会科学类的理论书籍、中外作家作品全集或选集、与自己研究项目有关的各种史料。

——宋剑华

【书径】

经常是一目十行、泛泛而读,但眼睛里必须有“活”。只要自己的眼睛一亮,立刻停下来,将前后几段的文字回读,慢慢咀嚼、细细品味,就一定能够发现有价值的东西。

【书语】

书中没有黄金屋,却有无穷无尽的知识。

【近读】

叔本华:《叔本华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  
梭罗:《瓦尔登湖》,译林出版社  
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台湾出版社  
郭庆藩:《庄子集解》,中华书局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自荐】



宋剑华:《解构与重构:新文学理论叙事研究》,人民出版社  
本书从“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民族”以及“人与自然”等方面,全面分析中国新文学作家在传统文化“破”与“立”之间所表现出的复杂心态。



作者供图

宋剑华,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出版学术著作15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著有《胡适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基督精神与曹禺戏剧》《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与建构:新文学理论叙事研究》等。

我的阅读史,其实同大多数人一样,都是因时而变、因需而变。1978年上大学,读的是中文系,那时候读书一是为了增长知识,二是为了应付考试。所以,除了老师布置的经典阅读,主要还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性地读书。那个时代,读书近乎疯狂。我们宿舍一共7个人,无论谁拿到一本书或一本杂志,绝不可能在短时间交还回图书馆,一个人看完就传给另一个人,深更半夜也打着手电筒看。我自己喜欢阅读三类作品:一是外国文学作品,诸如古希腊神话和悲剧,莎士比亚、莫里哀等人的一些戏剧,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人的小说;二是唐代传奇、宋代话本以及明代冯梦龙和凌蒙初的“三言两拍”;记忆最深的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三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凡是教材上提到的那些作家的代表作,几乎都走马观花看了一遍。如果说哪些作品对我产生过影响,当属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散文诗《野草》。尤其《野草》中那种生命难以承受之重,随着年龄的增长体会也越深。

读研究生以后,由于专业研究的需要,读书习惯则从“泛读”改为了“精读”,也就是职业性读书。在此期间,有相当一部分时间,都在阅读西方哲学书籍。因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西方哲学书籍大量引进,从古典的到现代的,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为了赶时髦,同时也是为了写论文,于是便蜻蜓点水般地看了很多。说实话,大多数都似懂非懂。但有一本书我看的次数最多,那就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撰写的《人论》,它使我真正认识到了人的本能需求,了解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其他大半天时间都花在了专业读书上,读了很多中外文学名著,精读使我受益匪浅。举个例子吧,当时导师让我写一

篇经典文本的阅读感受,于是便找来了《文学季刊》上的《雷雨》初刊本,晚上整整读了4个多小时。反复阅读《雷雨》的“序言”,觉得这部话剧作品绝不是反对封建家长制那么简单。我把这一想法写成了一篇文章,忐忑不安地寄给了曹禺先生本人。后来,日本学者牧阳一告诉我,曹禺先生将这篇文章转给了他,他参考了我的研究思路,并在博士论文中向我致谢。1991年夏天,我到天津开会路过北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田本相教授的引荐下,专程到北京医院去看望曹禺先生。曹禺先生告诉我,1947年他访问美国时,就有美国学者同他谈到过这一话题。他鼓励我遵从本心,把这一课题研究下去。后来我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完成了以《基督精神与曹禺戏剧》为题的博士论文。

毕业后的几十年里,我一直都在大学里教书,因为承担着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工作,所以书也就读得多了起来。但主要是按照我的研究兴趣,有计划地读书。在这一时期里,阅读理论书籍或作品文本时,不再是单一性的理论“精读”,而是采取了一种“带入”性的体验阅读。这种体验式阅读,对我的学术研究促进很大,先后出版过10几本学术著作,发表过300多篇学术论文。

对我个人而言,专业读书是既快乐又痛苦的一件事情。说它快乐,是因为读书可以使人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了解世界万物的博大精深,获取更多自己无法知晓的人生经验;说它痛苦,是因为为了研究,就必须深度阅读、苦苦思索,从无数现象中去寻找规律,并将归纳成一套理论体系,为此常常夜不能寐。阅读之苦,一般读者恐怕难以想象;然而,一旦有所收获,便会喜形于色。故我把这种专业阅读,称之为“苦中作乐”。

书中有真趣,皆从本心来

□姚玳玫

我家三口人分居北京、广州两地。广州有两套房,退休前住市区,上班和生活方便;退休后退居郊区,安静,空气好。生活在哪里,书房就在哪里,不同书房有不同的书。所谓书房,没有高号,就是工作、生活和读书的地方。常常案头凌乱,书籍堆叠。

——姚玳玫



易芝娜 摄

姚玳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著有《自我画像:女性艺术在中国(1920—2010)》《垒建新文学价值的河床(1923—1937)》《多元共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第二卷)》《文化演绎中的图像:中国近现代文学美术个案解读》《想像女性:海派小说(1892—1949)的叙事》等。

【书径】

阅读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细读也可以浏览,可以通读也可以局部地挑着读,跟着感觉走。对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读法,没有千篇一律的方法。懂书者自有自己判断一部书值不值得读的嗅觉。

【书语】

书是我离不开的朋友。

【近读】

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三联书店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  
何伟:《埃及的革命考古学》,远足公司  
奥尔辛·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

【自荐】



姚玳玫:《垒建新文学价值的河床(1923—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  
从多个角度考察1923—1937新文学价值体系建构实践的复杂历程,其价值确立和价值传承的路径和方式,在多元文化格局中新文学评价规则如何建立等。

哲存、黄秋耘、筱敏等人的随笔,一本本地读。与作家打交道多了,自己也尝试写随笔,用感性的文字,写周边的生活。那时刚刚当母亲,那个牙牙学语儿子的一举一动成为我取之不竭的素材。

调入高校之后,阅读的兴趣发生变化,由关注生活转向关注历史。较少专门读随笔了,更多读的是各类文集、日记、年谱长编、与史迹相关的史料汇编,研究专著等,着眼的是文字的历史价值、思想文化价值而非仅仅是审美价值。阅读过程始终抱着看清历史真相的心理期待,有另一番趣味。

我最早一篇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讨论白居易《长恨歌》中李隆基与杨玉环是否存在“爱情”的问题。之后,对通俗类言情小说总是情有独钟,作“三言”“两拍”、鸳鸯蝴蝶派小说、海派小说、张爱玲小说的研究,都与这一路子有关。

虽然职业变化,阅读也发生变化,但阅读的兴趣大方向变化不大。我的博士论文做晚清至民国时期海派小说研究,与我早年喜欢读感情类读物有关。我先王璜生在1990年代至2000年间任职于广东美术馆,我也深受其影响,更关注女性类图像与情感类作品,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策划主持了相关展览,并出版了学术专著。

退休了,不再承受在职时的科研压力了,阅读变得轻松自在。原先的学术兴趣依然延续着,但已不是那么狭义,而是更宽泛。儿子在大学读历史系,专攻秦汉史。一家三口阅读,交流,旅游,阅读范围从人文气象到历史地理,无所不包。

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走的路,也照亮我的生活。